



唐弢:站在历史当口,探索中国学术道路

□ 冷川

学术史上最令人心动的时刻,莫过于一位有积累的学者遇上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唐弢转向现代文学研究,恰值这样一个历史当口。

从郑振铎的遗愿谈起

唐弢赴京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故事,大概要从郑振铎先生的遗愿讲起。1958年10月18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郑先生生前有两个未曾完成的愿望,一个是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古本戏曲丛刊》此时刚刚出到第四辑,而何其芳建议的《古本小说丛刊》,尚未实施;另一个就是调唐弢进京,主持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郑振铎为何如此信任唐弢呢?这恐怕与二人的治学理念接近以及在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界的合作经历有关。

唐弢本名唐端毅,浙江镇海人,中学时便因家境窘迫而失学,但凭借刻苦自修考入了上海邮政管理局工作。唐弢的兴趣广泛,尤其对于野史杂著颇有心得,深受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影响,对于文章的文脉章法也有细心的揣摩。20世纪30年代初,他投稿于《申报·自由谈》的一系列文章,酷似鲁迅的文风,迅速引起文坛关注,批判者将其作为鲁迅的一个新笔名加以围剿,称赞者惊讶于作者文字的老练从容,这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鲁迅本人也注意到了唐弢,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戏称:“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挨骂。”稍后,唐弢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和自己相仿的阅读趣味,意识到了这个年轻人温和谨慎的外表下所包含着的和自己类似的炽热情感与鲜明爱憎。在有限的交往中,唐弢给了唐弢极为坦率且有针对性的建议,如对于自修外语的重视,对国外文学的有益补充,对长文章的驾驭和坚持,尝试撰写一部近代文艺史,用现实的关切去引导和组织自己文艺阅读的重心和方向,自然也包括了当下文坛活动和人事选择的斟酌……虽然在那个变动的时代中,这些建议并未能悉数落实,但对于唐弢的提升无疑助益良多。事实上,正是在鲁迅的提携和关照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唐弢已经成长为左翼文化阵营中一个较为成熟的战士。对于三十年代的文化,唐弢是亲历者,对其成就和局限都有切实的体悟,诸如此后对文坛和研究界问题的深远的“两个对口的论争”等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中国人向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向学术研究,理解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这种亲历者的优势是其他研究者无可比拟的。不过唐弢当时并未加入左联和中共,这同样出于党组织和鲁迅等人的关照。根据徐懋庸等人的回忆,鲁迅建议不要急于扩大左联盟员的范围,有些人留在组织之外,更便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为左翼事业贡献力量。党组织和左翼为应对特务的邮件检查,多在邮寄信件和刊物时,请邮局的进步人士待检查结束,邮包封口之际再将材料放入;而来信则用“存局候领”的方式,确认无特务发觉,再安排人领取。在这个过程中,唐弢等人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弢曾写过一篇短文《同志的信任》,讲到鲁迅如何冒着风险保护和传递方志敏的信件和手稿,他说“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相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革命斗争时期的唐弢本人。

唐弢和郑振铎的交往在三十年代日渐密切起来。相对于唐弢的审慎周密,郑振铎更加热情直率,所有的爱憎均展露无遗。郑比唐年长十五岁,是名副其实的兄长,在进步文化事业中,两人愈发接近。尤其是鲁迅逝世后,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人以复社的名义,主持《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如此丰硕的著作,如此紧迫的

时间,所有的审核者均是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挚爱义务工作,唐弢正是其中的一员。每天在繁忙的邮务工作后,他来到编委会默默地校读,这个经历也是唐弢日后从事鲁迅作品辑佚及研究工作的开端。1944年,当鲁迅北平藏书将要出售的消息传到上海,为之奔走呼号最有力的是郑振铎先生,而受命北行去与朱安交涉阻止出售事宜的正是唐弢。这趟行程中,唐弢切实看到了朱安等人生活的窘境,听到了其发出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要保存我啊”的呼求,也彻底看穿了以“赡养老母寡嫂”为名滞留北平的周作人的冷漠和整吝。正如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的,唐弢的文学气质,实则介于周氏兄弟之间,从理智上,他钦佩和追随鲁迅的战斗精神,而文学口味则因其性情,更偏重于周作人的舒缓从容。北平之行在其情感上是一个分水岭。唐弢的“弢”字,本义为“弓衣”,既有内敛平和之意,又有深藏其中的激情与锋芒,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他愈发贴近于鲁迅式的沉毅热烈、郑振铎式的爱憎分明。

和郑振铎一致的,还有二人对于文献资料的眼光和热情。郑先生在抗战期间为民族抢救文献的事迹尽人皆知,而唐弢这个“小兄弟”也在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有报道称,在沦陷的上海,唯鲁迅的文风,迅速引起文坛关注,批判者将其作为鲁迅的一个新笔名加以围剿,称赞者惊讶于作者文字的老练从容,这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鲁迅本人也注意到了唐弢,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戏称:“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挨骂。”稍后,唐弢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和自己相仿的阅读趣味,意识到了这个年轻人温和谨慎的外表下所包含着的和自己类似的炽热情感与鲜明爱憎。在有限的交往中,唐弢给了唐弢极为坦率且有针对性的建议,如对于自修外语的重视,对国外文学的有益补充,对长文章的驾驭和坚持,尝试撰写一部近代文艺史,用现实的关切去引导和组织自己文艺阅读的重心和方向,自然也包括了当下文坛活动和人事选择的斟酌……虽然在那个变动的时代中,这些建议并未能悉数落实,但对于唐弢的提升无疑助益良多。事实上,正是在鲁迅的提携和关照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唐弢已经成长为左翼文化阵营中一个较为成熟的战士。对于三十年代的文化,唐弢是亲历者,对其成就和局限都有切实的体悟,诸如此后对文坛和研究界问题的深远的“两个对口的论争”等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中国人向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向学术研究,理解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这种亲历者的优势是其他研究者无可比拟的。不过唐弢当时并未加入左联和中共,这同样出于党组织和鲁迅等人的关照。根据徐懋庸等人的回忆,鲁迅建议不要急于扩大左联盟员的范围,有些人留在组织之外,更便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为左翼事业贡献力量。党组织和左翼为应对特务的邮件检查,多在邮寄信件和刊物时,请邮局的进步人士待检查结束,邮包封口之际再将材料放入;而来信则用“存局候领”的方式,确认无特务发觉,再安排人领取。在这个过程中,唐弢等人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弢曾写过一篇短文《同志的信任》,讲到鲁迅如何冒着风险保护和传递方志敏的信件和手稿,他说“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相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革命斗争时期的唐弢本人。

郑、唐二人不光都有收书的热情,对于文献价值的理解也颇有相通之处。郑振铎写过《中国俗文学史》,在国内较早印行过民歌的集子,致力于杂剧和敦煌变文的收集和外整理,也和鲁迅一起刊印过《北平笈语》等图录,用唐弢的话来说,郑先生是有意“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观点去研究历史的”,唐弢本人同样有此方面的自觉和慧心。抗战胜利后,他开始书话写作,除了重视阐发传统的文献学价值外,也极力保存相关历史掌故,力图将每本书所附带的时代信息、人情愫

保留下来,所秉持的较为宽泛的文学理念与郑振铎等人极为相似。前面提及的邮局文献传递工作,唐和郑更有长久的合作。据他们的密友刘哲民回忆,上海沦陷时期,仅郑振铎和藏书家张咏霓之间的通信便有多百多封,均和文献的抢救整理相关,这些信件悉数由唐弢代为寄送,一旦被日伪查获,株连甚广。三百多封邮件,唐弢所谓的风险可想而知。郑振铎这位老大哥和唐弢这位小兄弟,他们的友情和信任,学术上的相通与理解,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试炼中,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探索体悟中,牢固地建立起来的。

文学所的建立及其对中国学术道路的探索

郑振铎兼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该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先后挂靠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但其工作方针的确定和高级研究人员的管理始终由中宣部直接负责,尤其是1958年后,文学所的政治、思想、业务均由中宣部直接领导,所从事的工作被纳入了国家中长期科研及意识形态规划之中。对该研究所的系统研究目前刚刚展开,但此前已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了社科院系统、作协系统和高校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科研实力的起伏消长。简单说,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新中国最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并非在高校,而是集中于社科院与作协,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王平凡的回忆,《文学研究所计划》中所列建所方针和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国内和外国中国文学史、《晦庵书话》等,编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极,作为一个有着出众资料功底的研究者,唐弢进入文学所,意味着那种重史料、重文献、同样兼重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的学术思路,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贯穿到了现代文学学科之中。从大的时代背景看,唐弢调入文学所恰逢新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关节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教材的编订有着浓厚的“苏联模式”的痕迹,理论家日丹诺夫、毕达可夫的著作,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给了探索现代文学教材的中国学者可资模仿的范例;同时,又由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的高度同构性,更早普及的《联共(布)党史》同样是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籍。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朱自清等人开始的现代文学考察与苏式教材书写相结合的产物。王瑶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阐述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将文学分期与政治分期尽可能地加以协调;在各时段中,对于不同文体的发展情况分门别类地加以介绍。《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新山之作,也是因为得风气之先,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的体量具有此后各著作无可比拟的优势。五十年代中期陆续出现的张毕来、丁易、刘绶松,对著作存在极为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庸俗政治化的倾向,而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则成为他们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1959年中,在文学所作与作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学人小传

唐弢(1913—1992),原名端毅,笔名风子、晦庵、韦长等。浙江镇海人。作家,文学史家。16岁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曾参加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上海解放后,被选为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科长,后进入高校、文化部门工作。1959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推背集》《海天集》《文章修养》《晦庵书话》等,编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联合召开的研讨会上,何其芳的发言极为引人注目。他以《文学史讨论的几个问题》为题,明确提出一部文学史应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作品评价恰当。在发言中,何其芳委婉但清楚地批评了上述文学史试图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组公式去概括复杂的文学现象所带来的弊端,并指出“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概念混淆、评价标准混乱、脱离历史苛求古人以及简单套用马列主义的表述、缺乏必要的历史常识等问题均有具体说明。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其芳提到文学研究所有文学史的写作计划,但其目标也是学术性的。

随着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松动,编写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被提到议事日程。主管部门有关领导提出,文学研究所的定位应着重于“提高”而非“普及”,要求文学所要“大搞资料”,建立从古至今最为完备的资料储备。在1960年年初中宣部确定由文学所现代组负责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这项工作并未匆忙上马,现代组的成员按照要求,对1958—1960年各地高校编写的十几部文学史进行了研读和评述,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概况做了全面普查。更为重要的是,唐弢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直接帮助下,邀请了茅盾、夏衍、罗荪、黎澍、陶然等现代文学运动的亲历者来所座谈代替文学文体解读辨析的做法,无形中降低了文学史写作作为一门科研工作的门槛,使之具备了批量复制的可能。

此后文学史的编写进入“大跃进”状态,一些高校的学生索性用开专家教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简编》。这批著作存在极为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庸俗政治化的倾向,而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则成为他们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1959年中,在文学所作与作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系需要细斟酌……这些谈话极大地拓展了编写者的视野,也活跃了他们的思路,使他们认识到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包孕的巨大的历史文化含量——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作为文学史家的唐弢和现代文学研究“门槛”的确立

1959年秋,唐弢由上海作协调入文学所,担任研究员和现代文学组组长。入所之初,他便向何其芳表示自己的心愿,一是写一本鲁迅传,另一个就是独立编写一部有特点的现代文学史。唐弢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与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一直成长于高校的知识分子不同,作为作家的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文字才华,作为藏书家对现代文学期刊、著作的精熟,以及作为现代文学亲历者对文坛历史的理解和体悟,都使他成为编写现代文学史的不二人选。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思潮+文体”的基本模式,唐弢有自己的角度,正如他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按我的设想,最好是文学社团为主来写,写流派和风格”。但个人著史在五六十年代并非主流,而文学所又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单位,很快个人写史的想法让位于文学所学术性文学史的集体计划,但如上面提到的,这个天折的项目在筹备期间展现出开阔的视野和雄心仍然令人为之心动。

可事情很快又有了变化。1961年,周扬受命主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是重中之重,唐弢及其团队的骨干成员无疑是最受信任的人选。无论是何其芳,还是唐弢本人,在经过短暂踌躇后,他们的党性原则使其坚决转向了作为文科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诚如较早从事学科史研究的黄修己所言,为了写好这套教材,国家投入的力量是空前绝后的。唐弢为该书的主编,此前有文学史编写实绩的王瑶、刘绶松、刘泮溪等人悉数参与,而参加此书撰写的中青年学者,如北大的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王德宽,文学所的樊骏、路坎、吴子敏、许志英、徐迺翔,北大的严家炎,厦大的万平,以及华中师院的黄曼君等,多在日后成为该学科的关键人物。教材要求的是知识性与稳定性,它不必是最具探索性、先锋性的,但必须扎实、准确,先作家的评价要经得起推敲,最大限度地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换言之,就著史的角度而言,这部文学史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底线,或者说它是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的“准入门槛”。

根据多位当年参与者的回忆,作为主编的唐弢与团队成员共同确立了五条编写原则: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转辗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纵的篇章。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应充分利用。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在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也暂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尽可能采用“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叙述中流露出来。除了第三条是教材所不得不具有的保守选择外,其余四条均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也体现了唐弢等人建立现代文学研究技术标准决心:熟悉原始期刊、回归历史场域,意味着文学史编撰历史品格的回归;从写出作品的时代氛围到梳理清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唐弢一再提醒青年研究者“点、面、线”递进的研究逻辑,既呼应了当时对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也使得每一个判断均言之有据。而对春秋笔法的强调则可避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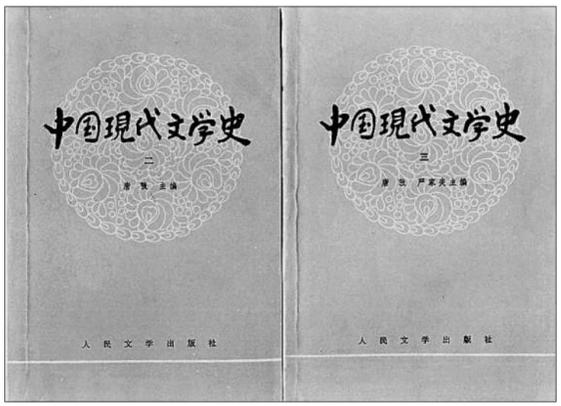
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实际具备的文学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资料图片